

斯大林暮年时期的苏联和德国问题

(关于 1952 年 3 月 10 日《斯大林照会》的起源问题)

A.M. 菲利托夫

苏联对外政策研究传统上经受了两种强大的截然不同的观点的影响。这就是或努力发现“烟幕枪”——即证明苏联对外政策的阴险狡诈；或努力证明其相反——即证明苏联对外政策“确无其事”，没有阴谋，其本意是改善世界形势。在这些出发点完全对立的情况下，把它们统一起来的是某种共性的东西：在东西方对抗的形势下，苏联好像是一位聪明的演员，它或追逐形势紧张，或追逐形势缓和，一会儿追求胜利，一会儿追求平局。

造成苏联对外政策研究中这种状况的，除可以理解的政治思想偏见之外，还有原始资料方面的原因。冷战时期，研究者所掌握的主要是官方公布的文件，报刊材料，“著名人物”的个人见证。后者的价值，显然与他们的主观主义程度成反比（而这种水平据考证还是很高的）；大众媒体的客观性也不容夸大，它所反映的至多是对外政策制定的结果，而根本不是这一过程本身，更不是制定这些政策的基本目的和方法；至于政府的声明、照会和公布的其他外交文件，起初它们只是论据体系的体现，尔后又为历史学家们所使用，或被用作“烟幕枪”，或被用来证明“确无其事”。第一种概念“烟幕枪”，自然是西方外交界提出的，第二种概念“确无其事”则来自苏联外交界。双方外交家和宣传者都充分动了脑筋，努力赋予其中每一种概念的合理、明确和完美无暇的形象——而这也成了历史学家们的手中财富。

现在有了根据原始档案材料分析苏联领导人进行外交决策过程的可能，所能看到的即使不是这一决策过程本身，那至少也是职能机关拟定这些决策及其在变成外交行动之前的动作过程。正是这后一个过程暴露了决策“风蚀”（走样）的特征。发现机关人员的活动目的和追求是很困难的，所以自然出现了一种诱人的作法，把这一切都归结为苏联对外政策机构中某种非理智的混乱现象。

苏联在德国问题上，尤其是在同 1952 年 3 月 10 日所谓的“斯大林照会”有关事件问题上的政策史，是苏联历史研究中长期激烈争论的题目，历史学家们根据上述两种态度路线对其进行了具体划分，还出现了“第三路线”。

我们知道，对 1952 年的苏联倡议历史上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倡议是真心实意，想按照德国不加入军事集团、全德自由选举、民主表达民意的原则实现德国统一。在苏联历史著作中和原民主德国，这种解释被看成是“现实社会主义”国民美德的体现（尽管是以斯大林的身份出现的），不过随之也出现了一些疑问：如，为什么苏联方面长时间轻视西方驻德最高政委们关于举行国家选举（在东西德）的建议，为什么把选举和建立全德政府问题同和平条约问题联系在一起（以前正是西方提出了这种联系，而苏联的立场则是应先成立政府，然后过几年看它是否忠实执行盟国的要求再着手制定和平条约）？

被我们称之为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倾向的历史学家们企图回答这些问题。其回答大致如此：1952 年以前，苏联领导人希望在东德建立自己的仆从国，但是由于害怕联邦德国军国主义化，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最好“放弃”民主德国，以此换取西方拒绝西德加入北约。这样，“三月照会”则成了“拯救”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苏联政策失去了彻底性和高尚道德特征，但最受影响的则是西方政府、尤其是联邦德国政府，似乎它们更喜欢保持和加深德国和欧洲的分裂，对它们来说集团对抗和追求军备竞赛比推进民主甚至比“抛弃共产主义”还重要。（2 这一概念最初出现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见 Sethe P. Zwischen《波恩和莫斯科》，法兰克福，A. M. 1956。在不久前的作者中，这一概念表述最好的是 P. 施泰尼

斯大林暮年时期的苏联和德国问题

(关于 1952 年 3 月 10 日《斯大林照会》的起源问题)

A.M. 菲利托夫

苏联对外政策研究传统上经受了两种强大的截然不同的观点的影响。这就是或努力发现“烟幕枪”——即证明苏联对外政策的阴险狡诈；或努力证明其相反——即证明苏联对外政策“确无其事”，没有阴谋，其本意是改善世界形势。在这些出发点完全对立的情况下，把它们统一起来的是某种共性的东西：在东西方对抗的形势下，苏联好像是一位聪明的演员，它或追逐形势紧张，或追逐形势缓和，一会儿追求胜利，一会儿追求平局。

造成苏联对外政策研究中这种状况的，除可以理解的政治思想偏见之外，还有原始资料方面的原因。冷战时期，研究者所掌握的主要是官方公布的文件，报刊材料，“著名人物”的个人见证。后者的价值，显然与他们的主观主义程度成反比（而这种水平据考证还是很高的）；大众媒体的客观性也不容夸大，它所反映的至多是对外政策制定的结果，而根本不是这一过程本身，更不是制定这些政策的基本目的和方法；至于政府的声明、照会和公布的其他外交文件，起初它们只是论据体系的体现，尔后又为历史学家们所使用，或被用作“烟幕枪”，或被用来证明“确无其事”。第一种概念“烟幕枪”，自然是西方外交界提出的，第二种概念“确无其事”则来自苏联外交界。双方外交家和宣传者都充分动了脑筋，努力赋予其中每一种概念的合理、明确和完美无暇的形象——而这也成了历史学家们的手中财富。

现在有了根据原始档案材料分析苏联领导人进行外交决策过程的可能，所能看到的即使不是这一决策过程本身，那至少也是职能机关拟定这些决策及其在变成外交行动之前的动作过程。正是这后一个过程暴露了决策“风蚀”（走样）的特征。发现机关人员的活动目的和追求是很困难的，所以自然出现了一种诱人的作法，把这一切都归结为苏联对外政策机构中某种非理智的混乱现象。

苏联在德国问题上，尤其是在同 1952 年 3 月 10 日所谓的“斯大林照会”有关事件问题上的政策史，是苏联历史研究中长期激烈争论的题目，历史学家们根据上述两种态度路线对其进行了具体划分，还出现了“第三路线”。

我们知道，对 1952 年的苏联倡议历史上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倡议是真心实意，想按照德国不加入军事集团、全德自由选举、民主表达民意的原则实现德国统一。在苏联历史著作中和原民主德国，这种解释被看成是“现实社会主义”国民美德的体现（尽管是以斯大林的身份出现的），不过随之也出现了一些疑问：如，为什么苏联方面长时间轻视西方驻德最高政委们关于举行国家选举（在东西德）的建议，为什么把选举和建立全德政府问题同和平条约问题联系在一起（以前正是西方提出了这种联系，而苏联的立场则是应先成立政府，然后过几年看它是否忠实执行盟国的要求再着手制定和平条约）？

被我们称之为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倾向的历史学家们企图回答这些问题。其回答大致如此：1952 年以前，苏联领导人希望在东德建立自己的仆从国，但是由于害怕联邦德国军国主义化，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最好“放弃”民主德国，以此换取西方拒绝西德加入北约。这样，“三月照会”则成了“拯救”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苏联政策失去了彻底性和高尚道德特征，但最受影响的则是西方政府、尤其是联邦德国政府，似乎它们更喜欢保持和加深德国和欧洲的分裂，对它们来说集团对抗和追求军备竞赛比推进民主甚至比“抛弃共产主义”还重要。（2 这一概念最初出现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见 Sethe P. Zwischen 《波恩和莫斯科》，法兰克福，A. M. 1956. 在不久前的作者中，这一概念表述最好的是 P. 施泰尼

格尔 (Steininger R. Eine vertane chance. 波恩, 1985))

另一种相反的解释则是: 1952 年的照会是一种阴险手段, 目的是通过共产党人在联邦德国掌握政权或军事讹诈 (没有西方国家在西德驻军, 没有德国人的军队) 建立苏联对整个德国进而对整个欧洲的控制。(3 见, 例如, 科尔·弗里茨《Karg auf ganz Deutschland? Stuttgart, 1965.》)

这种解释的观点是: 三月照会寄给西方国家显然是希望它们否定这一照会, 从而保障苏联以宣传掩盖自己的意图——继续在东德进行“社会主义实验”和把德国的分裂彻底固定下来。这种说法在辩术上同冷战最激烈时西方的标准言辞不符: 它影射的不是苏联的侵略, 而恰恰相反是西方的失误, 无论是在军事计划方面 (如果苏联保持原状, 那这些军事计划何用?) 还是在对苏联建议的反应方面 (如果苏联的建议是宣传, 那不应该轻视它们, 而应该进行谈判揭露它们。结果是苏联的“虚张声势”成功了”) 显然, 关于苏联“阴谋”这种说法给严厉批评西方提供了根据, 这完全不是什么失误, 而是有意识地附合苏联这一“阴谋对手”。在冷战结束阶段, 在抗议“两个超级大国专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世界舆论的时候, 正是这种廉洁 (我们称之为《2·2》, 意思是, 《1·1》将意味着标准的苏联共产主义的廉洁《1·2》——意味着苏联政策中现实的积极转变说法, 《2·1》——意味着苏联政策向消极的侵略方面转变) 获得了最广泛的传播。(4 这种说法最有根据的理由, 见德国历史学家 G·格拉姆尔: Graml H·Die Marznot von 1952: Legende and Wirklichkeit, Melle, 1988.)

317 有了新的历史资料之后, 这一历史领域研究出现了什么新变化呢? 第一个研究者是德国历史学家 G 维季格 (Bemuz), 他获准进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 研究了 1952 年 3 月 10 日照会草案的拟定过程。他的研究结论是, 苏联倡议的目的既不是稳定当时德国的分开形势, 也不是企图证明分开形势的出现和持续“与己无关”, 其目的是“动员德国人反对西德政府和西方国家”。维季格报告说, 他在查阅原封闭的苏联外交部档案之前, 也认为苏联倡议的目的是宣传事情“与己无关”, 正是这些档案改变了他的观点, 认为“照会”是苏联“新战略”思想的体现。他把这一战略定名为“非军事手段的战争”。(5 G·维季格: Die Deutschland-Note vom 10. März 1952 nach sowjetischen Akten. In: Die Deutschlandfrage von der staatlichen Teilung Deutschlands bis zum Tode Stalins. Der Göttinger Arbeitskreis: Veröffentlichung Nr 448. 柏林, 1994, S. 83—111, 109.) 换言之, 就是存在这种倾向——由《2·2》概念转向《2·1》概念, 即冷战最激烈时期最为严酷而典型的概念。

但这种认识不是共识。另一位德国历史学家 B·洛特, 根据新的事实, 其中包括维季格使用过的, 得出了完全相反的评价。其积极程度大大超过了《1·2》概念范围, 乃至使他的批评者有理由说他近似“共产主义”论点。(6 W·洛特: Staling ungeliebtes Kind. warum Moskau die DDR nicht wollte. 柏林, 1994.) 这种指责是无道理的, 因为后者都是认为苏联和民主德国关系一直是完全和谐的人, 而洛特则认为 B·乌布利希和他的同伙的捣乱是苏联的统一的民主德国方针未能成功的主要原因。(7 令人遗憾的是, 俄罗斯某些报刊参与了毫无根据指责德国历史学家的运动 (见俄《消息报》, 1994, 8 月 13 日)。B·C·雷金在评论着给了公正的评价, 可惜, 这是俄罗斯科学界对本书的唯一反应 (《近代和现代史》, 杂志, 1994, № 4, 第 223—226))

如果说同一类文件容许得出互为矛盾的解释, 那史料研究的进步只能等待新材料的进一步发现。年轻的挪威历史学家 C·比奥恩施塔德 (C·бьорнстаг) 在俄罗斯档案馆里进行了新的探索。结果完全推翻了维季格的观点, 所得出的结论非常接近洛特的结论。的确, 对德国问题当时妥协解决的现实可能性的估计是十分悲观的。这是不足为奇的, 因为

在比奥恩施塔德后来，这种解决方案的反对者不仅是民主德国的首领们，而且还有苏联“政治局”，至少是它的大部分成员。（8 S·比奥恩施塔德：《苏维埃德国政治和 1952 年 3 月 10 日斯大林照会》，奥斯陆，1996。）

最后，在 В·乌斯特内（Масмни）的力作里提出了独特的概念。本文作者已利用其中一些词汇如“幻想”、“失误”、“理想和现实的混和物”说明 1952 年苏联倡议的特点。

（9 V·乌斯特内：《斯大林年代：冷战和苏联的不安全感》，纽约，1996，第 134—140 页。）这一概念很好地表达了对上述新发现的苏联对外政策内幕的印象：混乱，矛盾，公式化思维……但有一个问题：这一印象是否准确地反映了现实？在表面上非理性的背后是否还掩盖着某种（可能被歪曲了的？）理性？

我们还发现一点，所有上述作者（不只是他们）都使用诸如“斯大林政策”，“斯大林照会”，“斯大林认为”，“斯大林的指示”等提法。这些提法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实际？维季格认为照会的真实作者是当时的副外长葛罗米柯，起“总编”作用的是莫洛托夫——主管对外政策的政治局委员。洛特也说是这两个人（这两位历史学家找到共同观点是稀有现象！），作为“德国统一方针”的彻底拥护者，他举出了苏联驻德国监督委员会政治顾问 В·С·谢苗诺夫。比奥恩施塔德认为，照会概念是以 М·Г·格里巴诺夫为首的苏联外交部第三欧洲司的集体创作。我们发现，谁也没有找到斯大林的“手喻”。观点比较彻底的还是乌斯特内。比如，他认为，从和平条约草案中删除“最荒谬的要求”最终还是领袖干预的结果（/10/同上，第 136 页。）（顺便指出，乌斯特内未能完全形成关于斯大林不断谬误的认识）。但广泛利用历史文件的比奥恩施塔德指出，作这一修改的是莫洛托夫（/11/S·比奥恩施塔德上述著作，第 115，118，130 页。），完全不同意把某种作用归为葛罗米柯。真理在哪里？问题并非纯属抽象；对 1952 年倡议的历史评价依赖于对下述问题的回答：它是偶然现象，“摩尔人的最后一口气”，还是长期深思熟虑的结果？当时的苏联领导人们是否把它视为被证实是正确的或成功的措施？笔者在此文中试图剖析这些问题——当然是在思维进步和广泛引用各种历史文件的基础上。

第一个提出制定和平条约草案建议的文件（把它作为同西方谈判议程中的亮点）是本文作者在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里发现的，文件注明日期是 1951 年 2 月 24 日。稍后，3 月 6 日，第三欧洲司提出方案，规定了把和平条约问题提交巴黎四国外长会议（1951 年 3 月 5 日—6 月 21 日）讨论的具体程度。在这一文件中，援引有民主德国领导大体是二月中旬倡议的内容（来自苏联驻德国监督委员会领导人的情报一般不包含他们同“朋友们”会见的内容）。比较两份倡议的日期可以得出结论，苏联外交部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是从民主德国递交倡议时开始的。但维季格认为，柏林的外交行动是莫斯科主使的。（/13/G·维季格上述著作，S·92.）比奥恩施塔德找到的第三欧洲司 2 月 7 日的报告，其内容明显先于 2 月 24 日的文件，这证明上述推测是有根据的。（/14/S·比奥恩施塔德上述著作，第 54 页。）

无论如何，当时没能继续广泛的讨论。建议成立的和平条约草案起草委员会未能建立。而巴黎会议很快陷入了死胡同。

比奥恩施塔德是这样解释苏联代表团在会上的策略的：“看来莫斯科错过了现实的机会，以不让步取代了灵活，以倾注非军国主义问题（指德国——笔者）代替了和平条约问题”（/15/同上，第 62 页。）。关于“不让步”，这已是很委婉的说法，至于他们所说的问题，完全不是其主要问题成了巴黎会议的绊脚石。把德国和平条约问题列入外长会议议事日程没有引起争议，关于非军国主义化问题西方国家最后也准备接受苏联的观点。当苏联代表团突然提出应由外长们讨论的问题——关于大西洋公约和在国外领土驻军问题的新提案时会议中断

了。这些是当时苏联“揭露性”宣传报导所喜爱的题目，西方接受他们会被认为是间接承认这种宣传有道理。在西方代表团已做出让步的情况下，苏联方面突然提出新的要求是违反整个外交规则的。此外，讨论大西洋联盟问题应有所有成员国，而不应只有外长会议的代表——美国、英国和法国参加。否则苏联宣传机构所宣传的论点——北约内部不平等就会找到间接证明。对此，西方代表自然不能就范，这一点苏联方面十分清楚——但是它仍拼命坚持。关于苏联这种捣乱的动机，笔者早提出过某些推测{16/A·M·菲利托夫，《德国问题：从分裂到统一》，第142页.}；对这些动机需作进一步研究，不过这已超出本文讨论的范围。指出下面一点就足够了：无论如何，在1951年上半年谈论“外交部和平条约计划”还为时尚早，——正如比奥恩施塔德所说的。

乌斯特内提出了另外的动机和苏联倡议的起始时间。“草案的出现，——他写道，——是对盟国1951年9月14日外长（西方国家——笔者）华盛顿会议声明的反应，声明说，它们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取消对西德的军事占领制度并把它拉入正在筹建中的欧洲防御集团”{18/V·乌斯特内上述著作，第134—135页.}。这种观点比较接近真实情况，尽管还需作必要的补充。

我们来看一下史料。最初提出1952年3月10日照会概念的文件出现于1951年8月3日，即纽约会见之前。开始机关里动作很慢。直到8月28日，维辛斯基才批准和平条约草案起草委员会名单，名单略作改动。其中最重要的，委员会主任任命的不是国际法专家C·A·戈伦斯基，而是外交部副部长A·E·博戈莫洛夫，这表明了委员会工作的政治意义。规定拿出草案的期限是10天——9月6日。突然又加快了速度。9月8日，由格里巴诺夫签字，寄给博戈莫洛夫一份文件，标题是《德国和平条约基础草案提纲》{19/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82，目录38，案卷47，夹卷230，第21—34页.}。一周后，9月15日，由格里巴诺夫和Г·М·普希金（后者当时是苏联驻民主德国外交使团首长）两人签字，提出了《草案初稿》，博戈莫洛夫立即将文件转呈维辛斯基{20/同上，第35—40页.}。事之紧急超过了想象程度：看来副部长都没时间随文件写一封短信，而是不顾官僚礼仪，就像对下属批示一样，仅在第一页角上写道：“维辛斯基同志，请过目”。而后来，事情又惊人地慢了下来：9月20日似乎是出于惯性，又出现了一份改动不大的修改稿{21/同上，第41—47页.}，10月17日——又上递了一份（寄给第一副外长葛罗米柯）{22/同上，第59—64页.}，然后草案——便被束之高阁。事隔一个半月之后才又启步：1951年12月3日，格里巴诺夫又原封不动地把一份草稿寄给一名副外长——B·A·佐林（显然，由于葛罗米柯临时不在）{23/同上，第50—55页.}。

我们暂且不谈这段历史而转向乌斯特内的观点。纵使苏联领导事先知道了纽约会议要干什么（通过报刊和谍报），这也只能说明外交部工作人员及其领导8月底9月忙忙乱乱的原因，很难理解为什么西方国家这一会议决定公布之后这种忙乱又消停下来。显然，事情不在这里。

这里我们再指出一个情况：在我们所看到的历史文件中，既感不到有什么不安，也看不到对联邦德国打算加入西方军事体系有任何反应。而且，这种不安在较早时期——四国副外长巴黎会议以前和会议其间——在比奥恩施塔德看来，当“莫洛托夫非军国主义化战略”{24/S·比奥恩施塔德上述著作，第62页.}启动的时候，也着实难以发现。的确，在这方面已发表了不少意见，乃至对于德国问题已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但拟定草案的人和给他们规定工作方针的人是如何想的呢？

的确，第三欧洲司关于未来同西方讨论德国非军事化问题时可以提出哪些具体建议的考虑令人印象深刻。{25/出处同上，第57—58页（引用，1951年1月9日文件——俄对外政

策档案馆，全宗 07，目录 24，案卷 188，夹卷 16，第 1—19 页）。}但不要忘记，这些考虑在巴黎会议中断后成了一堆废纸，而我们知道，是谁中断了会议。而第三欧洲司对“奥地利方案”思想的套定态度对德国意味着什么？奥地利倒是一个非军事化国家，但在第三欧洲司副司长库德里亚夫采夫 1951 年 3 月 21 日签署的报告里断然写道：“……把奥地利经验原封不动地用于德国对苏联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假如苏联方面同意这一点，民主德国政府代表将明显处于少数地位，对全德政府决策将不能起什么影响……这种恢复德国统一的计划同我们按照对等原则实现德国统一的纲领不符”。{/26/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82，目录 38，案卷 74，夹卷 233，第 34 页。}

“按照对等原则的统一”这个术语可有不同解释，但这较之防止德国军国主义复活完全是另一个目标了。

322 顺便指出，重新武装西德问题，大概不用照会和苏联抗议就可打消——只需真实公布民主德国人民警察的数量和质量参数就足够了，因为正是无端的臆测和过分夸大这些参数是阿登纳及其美国盟友贯彻西方军事一体化方针的主要宣传武器。不过“冷战”时期人所共知的“秘密战线”的文件说明，正是从东方抛出了这种虚拟情报，想以“工农国家”的强大实力来威胁西方。{/27/N·Wiggershaus. Bedrohungsvorstellungen Bundeskanzler Adenauers nach Ausbruch des koreanischen Krieges, in: Militä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 1979, s.103-104.}

有趣的是，乌斯特内本人表达了这样的意见，斯大林“没认真对待他关于欧洲防御集团企图成为侵略工具”的观点，乌斯特内还举出了上面提到的东西方宣传默默合作（否则便不能说了）的事实。{/28/V·乌斯特内上述著作，第 102，138 页。}无论如何，这是与他关于苏联倡议是对感受到的“来自西方的威胁”的反应之命题相左的。不过，他把 3 月 10 日照会同西方把联邦德国从占领桎梏下解放出来的打算联系起来是绝对正确的。的确，这种打算不是在纽约会议上提出的，而是在 1951 年 7 月 9 日的关于即将终止战争状态的声明中提出的。

应该说，第一个反应不是怎么建设性的。早在 6 月 14 日，当收到第一批关于西方即将采取步骤的情报的时候，第三欧洲司副司长库德里亚夫采夫就提议给西方三国提出抗议照会，并建议人民民主国家也提出类似照会。{/29/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82，目录 38，案卷 47，夹卷 230，第 10 页。} 7 月 13 日格里巴诺夫把相应草案呈葛罗米柯审阅。葛罗米柯把文件转呈了莫洛托夫，但后者否定了草案。形式上似乎是建议“暂缓”抗议，但实际上是暗示不要搞纯粹的“揭露”外交。{/30/同上，第 5 页。}于是出现了（在上面提到的格里巴诺夫 8 月 3 日报告里）后来于 1952 年 3 月所实现计划的第一个构想。与三国虚伪的声明（《即将终止同德国的战争》）相比，所提出的措施是个积极的抉择，这再次表明，应到哪里寻找苏联三月倡议的初始动因。

为什么西方声明对苏联政策有如此大的刺激，较之以前重新武装德国的计划其刺激要大得多？{/31/维季格具体指出了这一点，他注意到，成为苏联政策“主要靶的”的不是关于欧洲防御集团的军事条约，而正是关于联邦德国和西方三国关系的条约。洛特倾向认为，早些时候的倡议（如 1950 年秋开始的“德国人争取一个桌子”的运动）是出于对西部重新武装的担心，而 1952 年起了主要作用的是对西德争取主权运动的反应。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G·维季格上述著作，第 90 页；洛特上述著作，第 174，180 页）。}看来答案应顺着下面问题去寻找：为什么苏联对乌歇尔计划的反应要比对“杜鲁门学说”强烈得多？美国的经济援欧计划对苏联的整个控制体系（控制其势力范围国家）构成了威胁，尽管杜鲁门在 1947 年 3 月 12 日的讲话里承认欧洲分为两个阵营，认为控制“自己人”不向对方开小差而采

取极端措施是合法的。{/32/见本文作者所撰《冷战是如何开始的》一文，载《冷战年代（1945—1985）苏联的对外政策。新概念》，莫斯科，1995年，第49页。}相应的德国非军国主义计划原则上是苏联霸权制度的“加固剂”，是其他暴力手段的一种辅助工具。而西方国家同联邦德国的关系由占领关系向条约关系过渡是一种危险的挑战。

首先，它不能不刺激民主德国领导人也向往在其同苏联的关系中也实现类似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哪怕是最间接的，也是同晚期的斯大林主义的典型倾向——严格控制“朋友”，甚至不允许它们有独立或自立活动的表现——相抵触的。在民主德国控制特权上作出“让步”可能在其他仆从国里也造成类似倾向。此外，把西方提出的它同联邦德国发展关系的模式作为苏联同民主德国关系的榜样，将意味着承认这一模式的正当性，承认西方这一模式制定中的优先地位，至少是意味着承认西方政策不是单一涵义的。还将意味着放弃关于西方对西部德意志人实行“殖民主义压迫”的理论。在斯大林教条主义条件下，未必可以指望有这种转折。

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签订和平条约的思想可解释为首先是对民主德国“朋友们”的一种呼吁，是对他们向往更多自主权利的一种回答。这一回答包括在训令中：必须提出不是终止东德占领（西德也一样）而是终止全德占领的问题。这一方针能否实现，苏联领导并不关心，看来令他们最为不安的是如何掩盖这一方针里所包藏的动机——给自己的统治范围“拧紧螺栓”。但表面上要把它说成是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克服德国分裂的需要。

这一任务显然与格里巴诺夫1951年8月3日和9月8日分析报告中的许多点不符。把这些分析报告同8月15日和28日的报告以及上面提到的9月15日的和平条约基础草案初稿相对照，便会发现，文件修改是沿着什么方向进行的。首先，民主德国应公开提出加速制定和平条约的倡议，而且要同普遍号召讨论“全德自由选举”问题相结合（8月3日的报告里根本没提民主德国倡议的事）。~~在~~在德意志许多具体问题上，苏联的立场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例如，9月8日的报告建议把东德“民主造成”作为整个德国的样板，而9月15日的草案中则换成了较为灵活的提法；{/33/见9月8日草案序言《II》条（“指示德国必须巩固在东德进行的民主改造”）和9月15日文件的第5条（“按照波茨坦会议决议和德国人民意志在德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所进行的所有改造必须在德国和平条约中固定下来”）。见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82，目录40，案卷47，夹卷230，第22，37页。}前一个文件中对军事生产问题，有两处是矛盾的（第20款允许{/34/“德国不应该超过和平条约……条款所规定的军事力量所需界限，在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里生产任何数量的任何型号的军用物资和技术装备”。同上，第27页。}，第31款则禁止{/35/“禁止生产武器，军事装备和战炮以及所有飞机和海军装备”，同上，第29页。}），第二个文件取消了矛盾之外，主张德国人可以有自己的军事工作{/36/见第13条：“允许德国生产军事物资和技术装备，其数量和型号不能超过和平条约为德国规定的部队数量所需界限”。同上，第40页。}。

从整个情况看，外交部领导人没能完全在两个方案之间做出选择，而是让第三欧洲司制定和充实了两个方案。这样可以解释格里巴诺夫工作中为什么发生了急剧的转折（在上述所有文件中都有他的签字！）。有一定迹象表明，维辛斯基主张“加速行动”，但很快进入了死胡同。1951年9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批准计划，这反映在8月15日和28日的报告中。外交部机关由一片紧张匆忙转为某种停止状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这些事实对某些历史评述是一个修正。维季格明显错了，他实际上把9月8日的《提纲》和9月15日的《草案初稿》当成了同一个文件。紧随其后，乌斯特内也错误地认为，3月10日照会的这些新意，如承认德国拥有军队和军工生产的权利，恢复原纳粹分子和军人的

↑

掉的
补译

324

第二，话题指的是外交行动比最初计划的更持久和多阶段性。
第三，在德意志许多……

权利（法庭判刑的战犯除去），是在苏联倡议制定过程中晚些时候出现的{/37/G·维季格上述著作，第96—97页；乌斯特内上述著作，第136页。}（实际上，第一个原则出现在9月15日的文件中，第二个出现的较晚，但也在照会出现之前很长时间——1952年1月4日）。乌斯特内甚至比维季格走得还远：他认为，“荒谬清单”（即那些极端的甚至在宣传上也不合适的东西），——在格里巴诺夫1951年9月8日拟定的《提纲》中的确有这些东西——，在1952年2月18日之前的外交部草案文本中一直存在，只是这时根据斯大林指示才换成了较短的和较少争论的条款。他所依据的是被保存在某一档案中和作《德国和平条约》的文件。这里明显是误会。没有任何根据或理由认为，这个出现在《方案。谢利亚尼科夫》夹卷中的投标日期的文件什么时候被斯大林或什么人看过，上面没有批注多半说明事情并非如此。{/38/见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82，目录40，案卷11，夹卷255，第31—46页。}这里接近真理的是比奥恩施塔德。他指出，《谢利亚科夫方案》重复1951年9月8日《提纲》中的原则，它完全可能不是1952年1—2月间写的（乌斯特内这样认为），而是要早得多。{/39/S·比奥恩施塔德上述著作，第84页。}但他轻视《提纲》被否定的事实而接受对明显不能实现的文件的未必可信的详尽（不值恭维）分析。

比奥恩施塔德对政治局1951年8—9月在通过外交部所拟文件过程中出现变故的解释并非完全令人信服。他认为，在政治局8月27日会议上，维辛斯基因未提出和平条约详细文本而受到“申斥”（他何以开始“驱赶”部下加紧制定条约原则）。从后来的叙述上看出，政治局意见变了，通过了（他认为是9月8日）推迟提出和平条约基础草案倡议的计划。按照他的认识，推迟的原则是出于这种考虑：希望东西德国人在这段时间里请求苏联提出和平条约倡议，这样可使莫斯科为自己放弃“非军国主义战略”做掩护。挪威历史学家戏称拖延到1952年3月之前的这段苏联外交活动间隔是“拯救”行动，认为在这段时间里，莫斯科把主动权让给了柏林，希望它组织德国民众对和平条约做出广泛的积极反应。{/40/同上，第76—81页。}

鉴于这种看法，应该指出：威信考虑未必在苏联政策中起多大作用，在宣传影响下西德人突然改变自己政治的优先方面这种前景也未必能使苏联领导人迷失方向。正是在1951年，在东西德两个国家，在“反对重新军国主义化和争取和平条约”的口号下进行了“民意调查”运动。但到7月份，联邦德国仅收集到了170万签名，只占成年居民的6.7%——“这根本不是令人鼓舞的结果，尤其是考虑到所提问题的普及性”，洛特这样指出{/41/W·洛特上述著作，第176页。}。多半是由于问题是由极不得人心的民主德国当局提出的，所以才有如此不好的结果。吸引民主德国加入苏联倡议拟定过程的动机最终最合理的解释还是为了伪装，即想给外部世界造成民主德国独立的错觉，淡化它完全依附于“老大哥”和“老大哥”在这方面也不能有什么变化的事实。

遗憾的是，我们不清楚中央9月关于德国问题决议的全文（尽管通过外交部文件对它的引用我们知道它的存在及其一般内容）。尤其是不清楚，其中规定没规定期限（联邦德国拒绝同民主德国谈判或谈判中断之后“2—3个月”），如果没有收到“广泛反应”（认为收到“广泛反应”是非常可能的），苏联应什么时候提出和平条约基础草案。无论如何，放缓速度是提前定了的。但是，最关键的一点，这“2—3个月”（或其他时限）的起点未准确地确定下来。联邦德国政府对民主德国建议的消极反应按照愿望可不被解释为彻底拒绝，而是要求它在东西德关系中提出某种更灵活的新建议，或是提高柏林在同莫斯科关系中的地位。民主德国政府很快意识到了自己在这方面的可能性。民主德国驻苏外交使团团团长阿佩尔特1951年9月28日同苏外长的会谈记录证明了这一点。

民主德国特使谈话的中心意思是策略而坚决地给苏联方面提出一系列要求,从在苏工作的德国专家地位和被苏联政府没收的德国文化珍品的命运问题到向民主德国入境签证正常制度过渡问题(当时这些签证不是由德国人发放的,而是由苏联外交代表处发放的,甚至在那些已与民主德国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国家亦是如此)。有时,当谈话涉及莫斯科和东柏林之间存在矛盾的时候,也被认为是对“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不同态度。从这次谈话看,民主德国特使的兴趣不在这里,而主要是捍卫民主德国的国家利益,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德意志人的民族利益。不难看出,阿登纳在同西方盟友谈判中的类似行为——无论是在论据本质上,还是在其特点上。只是西德总理借口苏联对东德的让步也强烈要求让步,而阿佩尔特相反。应该说,后者的论据是有力的:西方当时在取消自己占领特权方面迈出了现实的步伐,而苏联方面实际上则是抓住不放,与宣传的相反。

在10月1日格里巴诺夫给会谈记录所附的备要报告中,对阿佩尔特所涉及的敏感问题形成了十分否定的立场。关于签证问题说,根据民主德国外交部早些时候给苏联监督委员会提的请求,“1950年3月底,苏联外交部已把这个问题提交上级讨论。上级机关认为改变民主德国现有出入境和过境程序不合适。问题被取消讨论”。至于文化珍品问题,格里巴诺夫“认为最好不予以回答”。显然,就连维辛斯基也认为这种立场太有违于外交礼仪,认为最好变换一下手法。在10月5日的第二份备要报告中,第三欧洲司司长采用典型的官僚主义的复文方式,通报说,第一个问题已交艺术问题委员会处理。任何回音也没有,如果有,也未必与“上级”和格里巴诺夫的意见有出入。{42/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82,目录38,档卷3,夹卷221,第88—91页。}只有德国专家在苏工作期限问题给予了较为具体的答复。

在这些情况下,维辛斯基自然不会被阿佩尔特的真诚表示——同意他关于扩大波恩政府权利和主权是“形式”的论点——所迷惑。苏联部长明显为对话者的行为所激怒,这从会谈记录中看得出来。结果,委托东德“朋友们”为和平条约做社会舆论工作,没警告他们注意“铁托主义”邪说,这种作法只是刺激了这种邪说。

自然,同真正的或潜在的“铁托分子”做斗争有着简便直接的方法——无情地清洗领导干部。乌斯特内在自己的著作里出色地描写了这一点,但他公正地指出,对民主德国和德国统一社会党适用这一方法是有限度的。{43/V·乌斯特内上述著作,第135页。}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柏林公开边界条件下,属于被清洗的当局工作人员和领导人可以考虑逃亡西方。制度不只是会被削弱(为了要除邪说,苏联领导敢这样作),而简直要垮台。所以,民主德国——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们面对苏联在他们中间开展“捉鬼”活动的企图,态度要比他们捷克斯洛伐克或罗马尼亚的同事们强硬。

最终还是出现了这种企图行动。1951年9月29日苏联监督委员会报纸《每日观察》刊登了题为:“洛哈要同志压制批评”的文章,攻击矛头直指乌布利希“世袭领地”——萨克森地区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书记洛哈要(乌布利希的红人)。原来,洛哈要上任是有人算计的,在这段时间乌布利希的立场应受到保护,但一点儿也没办到。苏联监督委员会驻萨克森代表乌拉佐夫在给谢苗诺夫关于同德国统一社会党萨克森区委副书记格列泽尔会谈(1952年2月2日,即发生必须作出干部结论“信号”4个多月之后)报告中通报说:“洛哈要受到批评还未彻底承认自己的错误……有时酗酒……有对妇女不礼行为征兆”{44/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与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37,案卷892,第4—7页。}。事情自然不在当事人的道德缺陷方面。重要的是苏联报刊上点名批评他半年过去了,对此一点儿反应都没有。这是对“老大哥”的直接挑衅。

有时固执表现为另一种，但在警惕和莫斯科观察者看来未必是无恶意的形式。在 1951 年 10 月 23 日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国家安全部长蔡塞尔批评了政治局即乌布利希的“工作作风”。对此的惟一反应是建议不把蔡塞尔的意见写进记录，“否则此事会引起苏联监督委员会的注意”。事隔一个月之后，苏监督委员会同德统一社会党工作处处长别布诺夫受命调查此事。但同他谈话的人 A·阿克克尔曼明显没暴露实情，只是说，提议对苏监督委员会保密此事的是 B·皮克{45/同上，第 1—2 页}。实际情况到底怎样不清楚，只清楚一点：对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压力增大了。

但需强调：没有达到搞“斯兰斯基案件”的程度。决定采取较为文明的“整顿纪律”的办法。问题在于，民主德国制度的脆弱不稳（甚至与各人民民主国家相比）不仅是对其领导人施加影响的限制器，同时也是对他们进行讹诈的工龄。他们已有充分的印象，苏联想通过他们的领导同西方达成有条件的协议，至少不能排除有西德吞并东德这一条件。

很可能，围绕 1951 年 10 月民主德国外长 G·德尔金戈尔同原东德基督教民主党同事 329 3·莱梅尔的秘密接触而出现的神秘且到底未查清的事件，正是带有这种性质。根据莱梅尔给美国当局提供的情报，德尔金戈尔说，“东方致立于德国统一的劲头儿是非常大的，就连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反面反应也奈何它不得”，并且谢苗诺夫和格罗提渥也直接赞成这种立场。{46/Frug, 1951, 第 3 卷，第 2 部分，第 1803—1804 页。比奥恩施塔德成功地发现了苏联驻东德外交使团头子普希金（他同德尔金戈尔就这个问题举行过座谈）和莫斯科如何理解这件事的材料。根据对找到的文件的分析，他得出了以下结论，东德外长是冒险行动的，没有得到苏联方面的允许和通知，他的行动至少引起了格里巴诺夫的怀疑（比奥恩施塔德上述著作，第 104—105 页；引用了以下资料来源：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 082，目录 38，案卷 61，夹卷 221，第 60—64 页）。德尔金戈尔后来被捕长时间关监狱可能就是这种廉洁的间接证明。不过，可能也有其他的解释：德尔金戈尔从苏联使团机构以外的渠道，比如从谢苗诺夫那里得到“指示”同莱梅尔谈话，而谢苗诺夫没有把此事告诉普希金和第三欧洲司。外长的悲惨下场是当时铲除知情者的典型例子（还不算最残酷的）。不过，如果德尔金戈尔当时真的表现了主动性，那这只能加强莫斯科“严加管教”不顺从和不可预测的东德领导人的决心。}

这一讹诈对乌布利希没起作用。很可能，美国人对德尔金戈尔的试探没作出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迂回办法——国际外交和苏联亲自积极参加德国事情辩论了。这样可使“朋友们”感受到自己的地位不稳，从而使他们较少固执。对此，自然应该（1）让他们明白，在两德关系中他们的积极和相对独立的作用今后不再需要，甚至是不可容忍的；（2）迫使他们自己“请求”苏联在德国问题上提出倡议；（3）不让他们知道这一倡议的时间和具体内容；（4）提出的倡议应使西方感到严肃而不敢等闲视之（否则，将遭真正接受人——东德和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轻视！）。

1952 年 3 月 10 日所完成的行动正是按照这一方针进行准备的。形式上事情是由 1952 年初两德政治舞台上的事件引起的：1952 年 1 月 9 日，人民议会通过了选举法，提出召开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代表会议以制定共同方案。联邦议院立即作出否定反应，这被认为是作为苏联倡议展开出发点的中央 9 月决议中所说的那种“拒绝”。照会正是在此两个月之后发出这种事实表明，一切都是按原计划进行的。

但是有几个问题。为什么正是对民主德国这一建议的反应被说成是彻底证明——证明对德国政治和社会舆论施加影响不能用德国同倍对话的办法？须知，正是这些建议没有遭到西方的强烈反对，东、西部德国人观点接近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比任何时候都大。怎么解释这

↑
330
个事实，外交部机关积极拟定《基础草案》出现在东德一月倡议及其被否定之前？正如上面指出的，外交部的这种工作冲动始于1951年12月初，当时隔了很长一段时间新方案才寄给佐林。然后又出现了一段工作狂热，这也是在对1月9日东德建议有了一定反应甚至是在这些建议本身提出之前。

实际上，3月10日照会的草案“原型”拟定于1月4日（在5页文件下署名的是格里巴诺夫、普希金和2名外交部工作人员科普捷洛夫和切尔沃夫{47/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5，案卷144，夹卷13，第2—6页。}）。1月11日，文件由葛罗米柯签字送呈莫洛托夫请求“在近日里”审阅。1月14日，修改后的草案（其中添上了在莫洛托夫同志那里开会时所作的修改，何时开的会不清楚）由普希金、科普捷洛夫和格里巴诺夫签字呈送葛罗米柯，当天葛罗米柯将其转呈莫洛托夫{48/同上，第10—21页。}。最后，1月16日，出现一个仍由普希金、格里巴诺夫和科普捷洛夫签字的短小文件，它为如何回答西方问题提出了某些基础，使能够对苏联的兴趣和支机作出某些推测。

首先，按其实质，这里说的是要回到格里巴诺夫1952年8月3日第一个报告所规定的倡议方案上去——迅速（比以前还要迅猛）展开宣传行动，淡化西方取消占领制度政策的影响。第二，这个文件与8月3日的文件不同，提到民主德国的作用，但这丝毫不表明对它有积极的评价。多半相反，间接肯定了它没能力（或不愿）对德国社会借古讽今施加影响，围绕和平条约开展运动。公然拒绝让它参与条约内容的研究。甚至在通报情况上，民主德国未被放在人民民主国家一列，而是将它与西方国家一视同仁。它只被赋予一种不为人注意的请求者的作用。在它提出“请求”和公布苏联草案之间只留“7—10天”时间是对“朋友们”的一种公然贬低：显然，在这么八天时间里，同他们不可能有什么重要磋商（以前，规定这段时间为“2—3个月”，在8月3日的报告里甚至确定为一个多月，这至少可以让人产生进行重要磋商的幻想）。

此刻民主德国——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转入了反击。关于反击的性质和苏联外交部对反击的反应可从同一三人小组——格里巴诺夫、普希金和科普捷洛夫于1952年1月20—21日为“上级”决议拟定的一套文件中看出来。{49/这套文件按标准包括：附信（通常是寄给莫洛托夫，由葛罗米柯签署）；给中央的报告草案（呈斯大林）；中央命令草案，附给苏联监督委员会崔可夫和谢苗诺夫的训令，令其转告民主德国领导人；和平条约基础草案和给三国政府照会草案文本。有时还附加一些补充文件，如果它们被规定为中央命令草案。}

↑
331
与以前所说的文件不同，那些都是作为“朋友们的意见”从苏联监督委员会寄来的，实际上它们反映的是在此之前已以莫斯科指示的形式告诉给他们的东西：这次所说的从柏林来的电报（NO8/80）看来确实是民主德国方面的倡议。很难理解，为什么崔可夫和谢苗诺夫还不知中央的意见就急忙支持它。这是一个主要没弄清的问题。其余的就非常清楚了：“朋友们”已提出申请，要求参与苏联计划的制订，所以要求与苏联有某种平等地位，而苏联方面已向它们指明这种地位。

应该说，外交部报告的某些论据多少给人以得体、至少是反映实际的印象。这首先是战败国不能为自己确定条约基础（基本原则）的论据。对柏林劳动分工建议的批评鲜明地反映了两国国家利益的客观矛盾：按照分工，苏联将被赋予为条约草案补充“于德国人不利”条款（如关于边界的条款）的使命，而民主德国则意味着只提“有利的”好在宣传上于己有好处的条款。最后，关于反对“共同条约”的斗争可妨碍争取和平条约的斗争这一原则的争议也反映着一定的现实：除了全德形式的诱饵以外，苏联方面提不出与西方政策抗衡的东西。按照当时苏联与人民民主国家关系的风格，取消了与它们协商的建议，而且把应预先通报的

国家也只限定为两个。

1月21日“三人小组”的草案被驳回修改（看来是莫洛托夫），未送到上面。1月24日又提出了“四人小组”的方案：这次作者又加了一个谢苗诺夫，很明显他是从柏林赶来的。文件可称是折衷产物，但这里指的只是：谢苗诺夫放弃了自己对民主德国建议的支持，而其他3人放弃了对这些建议的批评，而只批评谢苗诺夫本人。而且根本不提这些建议，就像没出现过一样。这种折衷未可能使“朋友们”高兴：批评可作为一个标志，说明承认他们是够格的对话伙伴：完全轻视意味着地位完全低下。此处他们只等听宣了：未来不仅不同他们协商，甚至不预先告诉他们和平条约草案的内容。（以前这种歧视条款只出现在中央决议草案里不见于要传达给民主德国领导人的训令中）。使他们能有一定慰藉的是，在新的中央命令草案里，甚至没有规定向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通报苏联的计划措施，但由于党的决定除了执行者以外任何人不得知道，这一慰藉也消失了。

显然上面认为，谢苗诺夫过份“自谴”，而另外三人有点复仇主义，所以应该给点甜丸吃。1月25日出现了第3个文件。其中又恢复了有选择地预先向“朋友”通报的条款，而且扩大了这种“朋友”的范围。现在这个范围里包括民主德国的领导人，准确说是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需注意领导和政府的区别！）。但仍和以前一样，没有同他们协商。恢复了对民主德国关于独立制定和平条约和集中精力反对（共同条约“建议的批评，尽管批评是针对苏联监督委员会的，而在拟定给“朋友”看的训令中这些批评被细心地删除了。

我们发现，这可能是斯大林看过的同以他的名字发出的照会有关的第一个文件（在他办公室来访日记里，从1951年8月9日至1952年2月12日没有一次接见{50/见《斯大林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访问者》，载《历史档案杂志》，1997年，第1期。}，所以完全可能，他没干事，尤其是在这段时间里没经手那些尚未完成和呈报“上级”批阅的文件）。无论如何，这是1952年政治局会议上研究的有关德国问题的第一个文件。

这次会议是1952年1月30日召开的。提交的文件未被通过，被送回修改。修改后的文件由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亲自签字，2月2日呈送斯大林（实际上，交莫洛托夫初阅）。初看起来，很难发现，“上级”的指示在哪里，是按什么方针修改加工的。如果仔细阅读文件可以发现，在程序上有某些变动：以前打算由民主德国向四国提出呼吁，而苏联立即照会三国；现在加了一个缓冲阶段：苏联照会民主德国政府，表示支持它的呼吁。看来这不大的差别，或许只是为了向德国“朋友”表示愿遵守外交礼仪（按照以前的方案——通过苏联给西方的照会！）。希望预先收到民主德国政府的呼吁书草案“以便提前研究”（也是新点子），这可解释为愿遵守相互通报情况的原则。

但是，如果分析2月2日报告的附件便可发现概念上的某种混乱。它表明，外交部没能立即领悟“上级”不满的动机。很可能政治局在交换意见时发现了不同倾向。实际上，“附件5”（给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信的草案“里已说，苏联给西方国家的照会和给民主德国的复照将“同时”发出。但为什么在后一个照会草案（附件2）里只字不提苏联反应的具体内容（给西方的照会附有条约基础草案）而只笼统地说苏联政府“采取一切可能的……”呢？在同时公布的文件里出现这种矛盾可解释为对民主德国态度不尊或令其出丑。

《附件5》说，即将发出的信将附拟定好的和平条约基础草案。假如给民主德国的通报也打算这样做，那么这意味着苏联的意图完全变了。我们记得，为了“申斥”东德领导人，要求把他们控制在捉摸不定的状态中，不让他们知道苏联可能采取的措施。但表面上要做出“东方集团”内部和谐的样子。现在完全变了：“朋友们”在正式要求制定草案之前，可知道苏联草案的全部内容；面对公众则说他们是从报刊上了解草案的！不过，为通报东德领导

人,也可能规定了同通报波兰或捷克和斯洛伐克不同的程序?回答这个总是困难的,因为外交部夹卷里从2月2日的文件里抽掉了需对这个问题作修改的附件:中央决议草案(明显是“附件”1)和对崔可夫和谢苗诺夫的训令草案。

334 ↑ 2月6日的文件说明了“上级”对外交部所拟德国问题文件草案意见的真正原因。它涉及两份材料,正是上述夹卷里所缺的那两份。这不是对外交部所拟文件的补充,而是新的行动计划。这样维辛斯基承认了以前所拟草案中的错误——没能领悟“上级”精神。这正是为什么夹卷里抽掉了有缺陷的文件——消灭痕迹。不能排除,上面有不内行外长的什么确凿证据。如是这样,就更不应把它们留在档案里了。

2月6日文件里的新的中央决定草案非常短。其中删除了批准(1)致三国照会草案;(2)和平条约基础草案;(3)致民主德国照会草案;(4)给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信等文件的条款。这样,取消了向“朋友们”通报苏联倡议的问题:既然什么都没批准,那还通报什么呢?而且,从给崔可夫和谢苗诺夫的指示中可以看出,应使民主德国领导人处于这种状况:既不知道苏联和平条约草案的内容,也不知道是否制定和发出这一草案,不知道苏联打算干什么!所以,应向他们详细交待的实际是他们自己呼吁书的内容和下述指令:应如何开展斗争,反对以前为定为分散和平条约精力的共同条约。这个文件鲜明地反映了德国问题“照会战”准备的实质:它的目的不是反对复活军国主义,不是争取德国统一,更不是争取社会主义,而是捍卫苏联——民主德国间占领和被占领这一模式的绝对性。

2月6日的方案没有遇到阻力,从整个情况看,没有做大的变动,政治局于2月8日通过了它。德国“朋友们”忠实地完成了所赋予他们的向莫斯科提交所需草案的使命。然后又忠实地接受了以政治局2月12日例行决定形式出现的外交部会议对草案所作的微小变动。从决定草案看,这一决定的名称应是《关于民主德国政府就德国和平条约签订问题给四国的呼吁书的草案一事给崔可夫和谢苗诺夫同志的指示》{/51/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全宗07,目录25,案卷144,夹卷13,第134页。}。

335 ↑ 2月13日,“朋友们”把所要求的呼吁书寄给了四国政府,其副本寄给了联邦德国政府。同一天,格里巴诺夫和科普捷洛夫向中央拟定了以下问题的呈文:关于批准给民主德国政府的照会及其递交时间问题;关于批准给三国的照会和所附和平条约草案问题;关于批准给波兰人民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府的信的问题。向西方国家递交照会的期限初定为2月20日,后改2月23日。现在尚不清楚,是否建议仍与此同步给民主德国政府递答卷答复照会。由于对民主德国的外交行动日期没有在中央命令草案里专门谈到,显然,这个不大合理的问题被放到了一边{/52/同上,第136—137,149页。}。

这个问题在尔后拟定的新的中央决定草案(该草案附于1952年2月15日呈“上级”信的后面)里被取消。同2月13日的草案相比较,新决定的名称变窄了:原来是《关于同民主德国政府就加速德国和平条约签订问题向苏、美、英、法四国进行呼呈有关的进一步措施》,现在改成了《关于苏联政府对民主德国政府就加速德国和平条约问题向苏、美、英、法四国政府呼呈的答复》。草案仅包括两点:1、批准答复文本和“经普希金同志以2月18日普通照会”形式寄出;2、在报上公布这一文件{/53/同上,第160页。}。

2月17日又出现了一个方案。对和平条约“保障恢复德国统一”的提法,在“统一”之后又补充上了一个短语:“和在没有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在全德自由选举的基础上选出的统一的全德政府”。葛罗米柯在附信中对这一补充发表了含糊的意见:“我认为,这里面没有什么必须要改的。但是也不排除,这一修改有意义,因为它符合波恩政府代表凯泽尔等人强调全德选举意义的意见”{/54/同上,第163页。}。令人费解的是,不知是根据谁的倡议

提出了这一“修改”。不过，修改被取消了。

2月18日，向“上级”递送了2月15日报告中提出的决定草案。向民主德国政府递交答复的日期改为2月20日，它的公布日期改为21日。政治局关于这个草案的决定是2月20日成文的。{/55/同上，第165，166页。}递交了给民主德国的照会，照会全文在报上登出。

2月23日，由格里巴诺夫签署意见，葛罗米柯签字，又向“上级”递交了新的中央决定草案。它应是苏联倡议起草过程中拟定的最后一个决定草案。题目是《关于苏联政府向美英法政府递交照会和德国和平条约基础草案问题》。决定草案包括3点：第一，批准照会和《基础草案》，它们应于“2月28日或29日”寄往三国政府。第二，委托外交部在“上述照会寄出之前，把草案告之民主德国政府以及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这里谈到了批准给后两国政府信的问题。最后，第三，在报上公布照会和《基础草案》{/56/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82，目录40，案卷11，第255，第14—24页。}。2个附件里都引用了所批准的文件。有趣的是，《基础草案》与1月25日文本相比没有任何改动。但在两个文件——照会草案和《基础草案》序言里，重又出现了以前删去的“关于全德自由选举”的提法。后又被人用铅笔划掉了。向“朋友们”通报的具体时间未定下来。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言而喻的。提出的草案3月8日政治局会上才研究，递交照会的期限确定为3月10日。“预先通报”的时间只剩下一天，准确些说是3月9日晚上。令人怀疑，这能否称得上是想训练伙伴们充当某种协商角色的“吹风会”。这大概是想收到突然的效果——使“朋友们”惊呆并让他们明白，如果他们表现出什么固执，或盘算什么与克里姆林宫主人的利益不一致的个人利益，那未来等待他们的将是类似的突然袭击。

现在来作总结，顺便说明一下我们的史学研究争论。文件无论如何没有证明维季格所肯定的命题：苏联打算对西德实施直接的或间接的侵略。他所引用的苏联文件（多半为给苏驻德代表的命令草案，指示他们应向“朋友们”说什么）不具行动计划的性质，而是这些行动的宣传掩盖。比较这类不同的草案，不难发现，其中对民主德国的利益和威信考虑得越少，那对帝国主义分子的“揭露”也就越多，就越是呼吁“民主力量动员起来”。相反，在对民主德国最“温和”的文件（1952年1月25日的文件）里，完全不提“动员起来”，只提德国人民争取取消现有德国分裂斗争的新阶段，而当2月6日文件里回到“朋友们”的实际矛盾问题时，则又出现了“动员起来”的论点。在这个文件里，反西方的辞令最多。即使在这个文件中，也根本没提把东德现有制度扩大到西德。其他相应的东西，由于在以前的和平条约基础草案里已有了，便不怎么提了，然后便彻底消失了。

顺便指出，未必可以把苏联对西德反对派的外交支持（支持他们反对阿登纳的对外政策方针）看成是干涉西德内政。这是正常的外交行为。在历史研究中，对这种支持的可能前景有各种看法。乌斯特内对此持否定怀疑态度，他认为，即使是3月10日照会中那些最“亲德”的原则也不能动摇西的民主和改变同西军事一体化的方针。洛特把这些前景看得特别重，认为照会中的新东西尽管没有号召西德民众和政治精英们立即改变政治意向，毕竟为“全德妥协”创造了一定的机会{/57/V·乌斯特内同上著作，第136页；W·洛特同上著作，第180页。}。对两们作者的某些论据可以提出一些质疑。如，乌斯特内写道，斯大林的目标是“亲苏的，虽没说必定是共产主义的德国”，他“指的是两战之间魏玛共和国的模式”；但可以称魏玛德国的政治是“亲苏”的吗？洛特倾向不要看重“动员—揭露”性言辞的意义，因为它们出自莫斯科。但特别看重那些出自乌布利希之口的言辞的后果。人们不然要问为什么？{/58/V·乌斯特内同上著作，第137—138页；W·洛特同上著作，第180—181页，第184

页。}

但对这些作者们（此外还有其他人，如维季格）最重要的批评意见还在于：第一手原始材料根本没有证实关于 1952 年苏联倡议动因、对象、目的和结果的传统认识。其动因既不是出于对西方“软弱”的考虑（这意味着可以“进攻”），也不是出于对它“强大”的考虑（这意味着必须“退让”）。对象完全不是西方社会舆论，目的完全不是东西方冲突，其结果在克里姆林宫看来绝不是消极的。晚期的斯大林主义的方针不是扩张，但也丝毫不是从自己势力范围撤退，而是全面保障和加强对这一范围的监督。可以认为，它在德国问题上的政策是一个例外——对此需要更多的依据，平常所引用的那些论据是不够的。

338 相应的，如果认为苏联政策的影响对象是“社会舆论”，那么这里所说的“舆论”指的是东德国家领导人的意见、政治情绪和行为模式。这个国家不是“莫斯科的东部殖民地”。边界朝西敞开排除了把野蛮镇压和大规模清洗作为使其完全屈从帝国中心操纵手段的可能。策略本身，制度不得人心和它面对西德国家模式的选择，这些增大了东德领导人对苏联监护人的筹码。西方国家同西德的关系向伙伴关系过渡使形势加剧到危机的程度。这要求采取非同寻常的办法，以便说服“朋友们”自己放弃利用这些筹码，不要在取消占领制度的计划上同苏联方面讨价还价。

看来，1951—1952 年苏联在德国问题上复杂运筹的主要目的就在这里。1952 年 3 月 10 日公布的倡议草案在起草过程中（在最高层）主要涉及的正是同民主德国领导人的关系问题，其次是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问题，这证明，它谈的是苏联集团的“内部事务”。苏联政策的意图在于，要打掉德国“朋友们”手中常使的“王牌”——从苏联利益的观点看，他们的作用不可替代，必须有德意志人的“工农国家”。必须使他们产生莫斯科准备“牺牲”他们的观念，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对德国形势的发展前景有信心，要让他们知道，他们要想保存他们的国家和自己在国家中的地位只有完全屈从和放弃“自己的意志”才行。如果认为上面提到的“洛哈要事件”是这种表现和相应的潜在冲突的标志，那么这件事的结局——1952 年 2 月罢免这位不幸的书记和由希尔德万取代他的职位（/59/Schirdewak K. Aufstand gegen Ulbricht. Berlin, 1994, 第 33 页。）（希尔德万是被作为乌布利希的对立面而被推上台的）则标志着这一事实，对民主德国的“精神战”取得了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3 月 10 日的照会在其发出之前已保证了斯大林领导集团的胜利。只是当时没有人看透这一点，因为实际的敌人是所谓的“朋友们”。直到今天，对这一点还有不同的解释。

339 现在，我们再回到史料研究的题目上，我们发现，本文作者所阐述的这些思想同比奥恩施塔德著作中提出的观点有相似之外。“苏联继续把德国看成是潜在的敌人，而没把它看成潜在的盟友”，这指的是，“遏制莫斯科所预测的德国那些发展倾向（消极倾向——A·菲利托夫），完全不是借助权术推进社会主义”，——他是这样评定 1952 年 3 月 2 月倡议制定时苏外交部所奉行方针的实质的（/60/比奥恩施塔德同上著作，第 99, 101 页。）。从这里可以看出，的确，外交部工作人员把西德看成了危险的象征，但是不仅这些，比奥恩施塔德在别处还指出了外交部工作人员对东德活动家在两德关系上某些非规范行动的怀疑，想限制东德在德国政策甚至贸易中的作用和权利（/61/同上，第 79, 105, 134 页。）。不过，按照他的认识，对“朋友们”的这种立场仅是第三欧洲司工作人员们所特有的，“最上层”对“朋友们”的立场则完全是不同的（正是这种观点至少是值得怀疑的，有争议的）。

我们详细分析一下相关的论据，而且它们都是建立在同 1952 年 1—2 月外交部草案通过“上级”进行变动有关的文件基础之上的。作者从柏林“骚动”破题：“……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建议对波恩和共同条约展开直接攻击。乌布利希的建议被德国处（即第三欧洲

司——A·菲利托夫)看成是排拨行为。格里巴诺夫从中看到了危险性,即东德的运动很可能使紧锣密鼓准备中的斯大林照会破产,使他同西方国家签订和平条约的希望破灭。但从这里绝不能得出这种结论,认为苏联领导集团和格里巴诺夫的反应是一致的。在政治局,东德人的想法倍受青睐。”{/62/同上,第124页。}结果,照会旨在妥协的明确概念失去了它的价值和明确性,这削弱了照会的影响。是苏联领导集团决策上的僵局导致了德国问题的僵局。《宣传或谈判——东被通过的决策》,《政治局什么也没有决定》——这些主要章节和结论部分的标题清楚地表明了作者概念的本质。{/63/同上,第116,133页。}

乍看起来,这一概念顺利地发挥了洛特的观点,表明了乌布利希及其心腹对莫斯科施加影响的机制——原来他有自己的“院外活动”。

340 但对这一论据可以提出许多严肃的异议。根据挪威作者的意见,政治局里冲突的程度可从它“从1952年1月30日—2月8日一连4次讨论如何回答乌布利希的提议问题看出来”{/64/同上,第124页。}。首先不清楚,这“4次”从何说起(按照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的资料,政治局只召开过两次会议——1月30日和2月8日,没有其他数据)。第二,没有任何资料表明,在政治局里有人表示过接受民主德国的提议。第三,1月30日之后,下面讨论过否定回答的形式,而且出现了使回答带有侮辱“朋友们”的倾向,同时这被认为是“上级”的意思。

政治局“允许东部德国人自己草拟和平条约呼吁书草案”,——作者写道,几乎把这说成是异乎寻常的“信任姿态”。{/65/同上,第116页。}是这样吗?第一,对“朋友们”不提“允许”,而是“建议”,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第二,详细告诉他们“拟定什么”;第三,责成他们把拟好的东西送来审查。这哪里有特别信任?

这样批评意见丝毫不意味着否定比奥恩施塔德的概念是向前迈出的新的有意义的一步。在他之前,只有维季格触及过外交部所拟文件的通过问题,不过他只是几笔带过。按照维季格的意见,“上级”不到3天就处理完了草案:1月25日葛罗米柯把草案呈递斯大林,而28日又致信斯大林重申从他那里得到的肯定回答。关于1月30日政治局否决的事只字未提,尽管不明白,为什么2月8日需要“更为简短的但内容一样的斯大林的回答”。{/66/G·维季格,同上著作,第99页。}大概维季格或是没有掌握全部文件资料,或是赋予了文件本身没有的但反映“独裁者”理论观点的思想。

341 与此相反,比奥恩施塔德概念中关于“斯大林政权金字塔”(尤其是其上层)里有不同政见的典型思想,自然是有充分根据的和有益的。自然得排除其中“关于亲乌布利希院外活动”的观点和其他许多明显夸大的成份。正如他的叙述所暗示的,未必可言什么具体划分正传的多数和教条主义的少数。但具体战名评说莫洛托夫,称其为这一“少数”的代表,“充分大胆或非常勇猛的摆脱思想教条主义”的活动家,{/67/比奥恩施塔德,同上著作,第124页。}可能显得——说得轻些——令人吃惊。

我想,后一种情况多半是对两位苏联领导人——无耻的但能装作“温和”的斯大林和坚韧、狂热的教条主义者“有铁一般意志的维亚切斯拉夫”——传统的对立神话的反应。{/68/这种神话发展的最新例子戴V·祖博克和K·普列沙科夫的著作中(Zubok V· and Pleshakov C·《克里姆林宫里的内战,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创侨(麻省),1996,第78—109)。}这种反应是可以理解,因为从文件的角度看,我们所研究的上述外交行动的其他参加者们都显得平庸无奇,所以从与他们的比较中,不难看出一些问题。

实际上,外长维辛斯基努力站在阴影里,而当他从阴影里走出来时则清楚地发现自己无能为力和孤立无援。葛罗米柯起了一个“邮筒”的作用,向上转递第三欧洲司的文件。他只

有一次发表过自己的意见（关于给照会里加上全德选举的条款问题），他的意见至多是模棱两可的，闹不好还要作反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维季格对他的作用给予过高的评价是难以令人接受的。其他副手的作用完全是昙花一现的。很可能，在1951年8月15日“和平条约基础草案初稿”拟定过程中起过积极作用的是博戈莫洛夫，但他很便脱离了德国事务。

苏联对外政策机关里许多计划动作环节的代表没有得到很好的展现。格里巴诺夫（比奥恩施塔德的“主人公”）和谢苗诺夫（洛特的“主人公”）很快便义无反顾地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和建议，像风向计一样，立即对“首长”的意见作出了反应。立场可被认为多少有点彻底的要算是苏联驻民主德国外交使团的头子普希金。不能排除，还是他应被认为是“斯大林照会”概念的“作者”。1951年8月15日的草案——这一概念的第一份草稿即第一份文件上有他的签字不是偶然的。很可能，1952年6月1日宣布任命他为外交部副部长是对他在制定苏联关于德国问题倡议过程中所作贡献的承认。顺便指出，这也间接证明了，尽管苏联领导人放弃了讨论苏联提案，但他们还是认为其使命完成了：成功地号召了民主德国的朋友们“就范”。

342 现在再回到莫洛托夫作用的评价上来，我们发现，除与其他的“斯大林学说外交家”相比较，所查阅的文件给人以根据改变某些习惯的看法。自然，说他的意见和修改给外交人员的创造带来了“新意和深度”，这未免有些有争议的和模棱两可的东西，加上某些教条和国家的立场观点。这表现在对在和平条约里加上“在民主的基础上改造德国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条款主张的评语上，称其为“抓住了要害！”表现在建议限制尔后是完全删除关于在德国“按照波茨坦会议决定所进行的所有民主改造都保持效力”的论点（70/1952年1月4日和21日草案正文和一旁的批注，俄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7，目录25，案卷144，夹卷13，第3，第35页。）。最后，还表现在这些细小的差别上：第三欧洲司拟定的文件草案里有这样的提法：“在德国领土上取消所有外国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莫洛托夫在“军事基地”一词后打上了句号，删去了后面的词语。（71/同上，第3页。）可以猜测到这一改动的原因：苏联的开采和加工企业——《维斯穆特》联合企业就属于“外国军事设施”。即使暗指取消它也不应该。在莫洛托夫看来，所诞生的核大国的国家利益是绝对的重中之重。我们已指出过一个因素：莫洛托夫完全赞成对“朋友们”加强控制的方针，但毕竟企图把压力限制在某种外交规则和礼仪范围之内，赞成这一政策的较为平衡的方法。

但，是什么引起了最大的怀疑和反对意见，这与其说是对莫洛托夫在“斯大林照会”起源问题上所起作用的新解释，不如说是对这种作用能改变什么和能影响什么现实前景的完全消极结论。莫洛托夫是“少数”，政治局掌舵的是斯大林，没有通过有利于折衷和实用主义决定的任何可能，这意味着在德国问题的折衷决定上没有所谓“坐失良机”的问题。这就是比奥恩施塔德的逻辑，这一逻辑使他的概念有别于洛特而接近于维季格和和乌斯特内在这个问题上的论点。实际上，这意味着比奥恩施塔德完全改变了他以前关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对立的概念。而且，关于斯大林的观点和作用，关于当时苏联对外政策舞台上这两位主要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实际上没有列举什么事实。可以说，这不是撰写这些问题的作者们的过错，而是他们的不幸。不过接近这个问题的真谛，还是有路可寻。

343 这里关键的因素是分析1952年1月25日草案（“莫洛托夫草案”）向上呈递、政治局1月30日否定这一草案（明显的“斯大林决定”）和文件后来命运的变动情况。如果弄清“政治局”反对和修改草案的内容（反映的是斯大林的意见），去掉维辛斯基传达中的明显歪曲，那么这多半强调的是赋予苏联外交行动以循序渐进的性质：“组织”民主德国方面的照会——对民主德国照会复照的间隔时间——对三国递交照会的间隔时间。想法是现实的。莫